治学方法

学问之道

□宋惠昌

这几年在与学员的接触中，感到有些领导干部钻研学问的热情很高，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如何进行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这里，就与他们互相切磋之中的心得，结合自己理论研究的经验，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姑且名之曰“学问之道”吧。

问题意识

在中国的词汇中，“学问”这个词的结构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学”和“问”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而组成的。在我看来，“问”是“学”的内在要求，或者也可以说是它的本质要求。在“学”的过程中的所谓“问”，也就是“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异想天开之类的怪念头，而是根据我们对客观实际复杂关系的思考，所概括出的一些矛盾。所以，“问题”，就是客观实际，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搞学问的过程中，怎么“从实际出发”？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从客观实际中的矛盾出发，实际上就是从问题出发。这就是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这里所谓问题意识，也就是要求我们搞学问、搞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基本思想方法，即从问题出发。强调“问题意识”，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不少的人，包括一些所谓“高层次”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从问题出发，不触及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矛盾，而是相反，或者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或者是从已有的结论（概念）出发。所以，他们的所谓“研究工作”，或者是演绎自己的那些概念，或者是按照既定的理论模式论证别人的结论。这样的所谓“研究”工作，对他们自己或许是有什么价值，但是，对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所谓“研究工作”，在思想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

哲学史上，有一些哲学家被称为怀疑论者，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怀疑论者在哲学史上是引起过一些非议的，但是，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思想贡献，这个贡献也就是提倡“怀疑”。在我国古代学者中，也有类似这样的思想家。比如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就提出了一种可贵的“怀疑论”。他说：“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李贽是个奇人，对他也有过不同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怀疑论”毕竟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反对盲从，提倡思考。而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学者来说，具有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那是比什么都要宝贵的。

现实生活中，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问题会层出不穷，矛盾会继续出现，这就给我们创造了丰富的研究机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研究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善于抓住那些有价值的问题。我认为，能够抓住那些有重要价值的问题，并给予科学的解决，这就是研究工作者的贡献。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多的问题，不是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比较敏锐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虽然还不能马上给予解决，这也是一种科学贡献。比如，自然科学中“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就是如此。社会科学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很显然，是有的。当然，究竟能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就要看我们的敏感和勇气了。

根据意识和产权意识

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一个大家都应该遵守的一般规则，叫作“说话要有根据”。同样地，在做学问即搞理论研究这件事上，这个规则也应该是适用的。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足够的、可供研究用的实际资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那些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材料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根据，当然，也是我们通过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的根据。

在历史上，那些有杰出贡献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搞资料出身的”，他们一般都是把积累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可以说是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自己曾经这样说过：“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

我们培养严谨的学风，也应该从这里做起。一般来说，写论文的“第一道工序”，应该是“搞资料”，而且应该是亲自动手，自己去搞资料。我们不少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引用了别人引用的资料，一查，结果是有问题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论文，里面的引文，有的是转引的，而转引的结果竟是“以误传误”。这显然是害人又害己的事情。所以，用别人搞的资料，往往是不可靠的。这就是说，用来作根据的东西，必须是经过自己亲自核对过的，才可以放心地使用。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都应该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而不应该是根据别人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难道这个问题还会成为问题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的确是个问题。前一阶段，学术界反对的“学术腐败”，实质上就是这样的问题。所谓“学术腐败”，说穿了，就是抄袭，就是剽窃。这样的事情，对严肃的研究工作者来说，本来是一种耻辱，可是，在一些场合中，却是屡见不鲜。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当然，这首先是个品质问题。但是，就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缺乏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观念——产权意识。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搞学问、搞研究，没有起码的产权意识，也是不合格的。

个性意识

搞学问，搞理论研究，从本质上说，是个创造性的行为。或者说，学术研究工作，是一种创新性的活动。很显然，无论是“创造”还是“创新”，其大忌都是“一般化”。这种“一般化”，最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空话、套话、大话。那么，这种缺乏创造性、没有创新性的“一般化”，它的要害是什么呢？这就是没有个性。看来，个性与创造性、个性与创新性，是有内在联系的。或者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个性的研究工作，没有个性的研究结果，是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工作要树立一种“个性意识”。

实践证明，研究工作过程以及研究结果中，如果没有个性，实质就是没有思想。人的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它的本质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个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研究结果，如果没有任何个性，这样的成果是不会有什么思想深度的；同样地，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个性，那也可以说他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这就是个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极为重要的价值。

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上凡是有过创造性贡献的大科学家、思想家，他们无不是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而他们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又必然是具有独特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有人常常把“标新立异”说成是个贬义词，我对此是持异议的。因为，在要求研究工作具有创造性、研究成果具有鲜明个性特征这一点上，宁可要提倡这种“标新立异”的精神。从目前的科学研究工作状况来看，这样的“标新立异”者是少了，而不是多了。当然，创造性的科学活动，要求自己的研究工作有鲜明的个性，敢于“标新立异”，勇于提出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有可能产生失误，因而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万无一失，我们大家都是人云亦云，重复那些一般化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

书海泛舟

麦家：在虚构中展现历史真实

□杨建民

2003年，一部名为《暗算》的长篇小说强力问世。2004年，由作者参与改编完成了该作品的电视脚本；2005年，34集的《暗算》电视剧开播，并随即引发收视热潮。由此，一个常常吸引人的谍战剧类型前面，加上了“中国”字样。小说作者麦家也以此成为该领域的先锋人物，甚至被称为“中国谍战之父”。

《暗算》这部作品之所以会引发如此风潮，首先是作者描述了人们相对陌生却真实存在的“神秘”工作领域：近现代谍报。谍报工作的神秘和特异，麦家通过一个瞎子却有着绝佳听力的“阿炳”，一位留学归国、有着自在性格的女数学家黄依依，以及革命先烈钱之江三个人物的表现，生动鲜活地刻画出来。

阿炳来到侦听机构701，有特殊使命。当时这个部门侦听的对象，来了一次大的调整。通过数十天的关闭，重新发出的电台信号全数改变。要想继续侦听，需要很长时间摸索寻找。可是，通过对先前侦听内容的迅速把握，阿炳在很短的时间，把对象的变化“听”了出来。再通过更为不可捉摸、微妙的个人击键手法等，把最后一批高级讯号“听”了出来，不可思议地完成了许多人很长时间不能完成的任务。

阿炳这个人物，人们很容易认为是虚构出的，认为他的听力“异禀”，是作者为了故事情节夸张描写出来的。从后来麦家的回应可知，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见识到这些特异之人，不过近来电视台播放的“最强大脑”节目，使我们直观地看到了这些长相寻常、大脑的某些方面却强大到不可思议的人物的表现。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阿炳”的听觉，是某些人可以达到的。虽然他们稀少，但他们可能从事的工作、方法，我们却从小说《暗算》中获得真实的感受。

黄依依是一位极富天才的数学家。在非常的情况下，被选入701机构。在其中，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思维，破解了被侦听的顶级密码，使我们读者感受到数学作为一门看似极端抽象学科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这是一般读者难能深切领会的情境。这两个神异人物（钱之光表现了另一种环境下的智慧和勇敢）的表现，虽然从表面看，都是解决了特异的问题，可他们的现实生活命运，却并不顺畅。阿炳后来因组织安排，和一位护士结了婚，有了孩子，可听力告诉阿炳，孩子不是他的，所以他触电身亡。黄依依在常人眼里，不好好“正经”工作，四处游玩，采花弄草，还喜欢和男人打交道，在似乎有些声名狼藉的情况下，被一个女人有意无意间伤害致死……麦家虽然为他们设计了可以发挥其“天赋”的场所，可仍然将他们置身在人群中。寻常人群的人伦社会关系，他们仍无法脱逃，这似乎不在他们擅长处理的范围内。这样的描写，使得作品虽然内容人们看似陌生，可人性的基本面，却能够深切感受。这种真实，使得读者从那些看去相当炫目的工作中，读到了现实，读到了熟悉真切的人性的诸多方面。

麦家作品颇多，另两部以“风”为名的作品《风声》《风语》也十分值得关注。《风声》讲述了地下工作者“老鬼”的故事。“老鬼”破译电报的能力超强，打入了日伪情报组织内部，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时，他机智地与日伪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周旋，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使得敌人内部陷入混乱，搞不清谁是真正的“老鬼”。但因条件所限，最后关头“老鬼”不得不牺牲生命，设法将情报成功传递出去。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破译工作的繁复，同时表现了人性的坚韧和信念的价值。作品结束时“老鬼”渐渐浮出水面，让人一方面领略到作者构思的精妙，另一方面丰富了人性的层次。《风声》以从容的写作耐心，强大的叙事说服力，为这个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加冕，以书写雄浑的人生对抗精神的溃败，以关注他人的痛苦扩展经验的边界，以确信反对虚无，以智慧校正人心，并以提问和怀疑的方式，为小说繁复的谜底获得最终解答布下了绵密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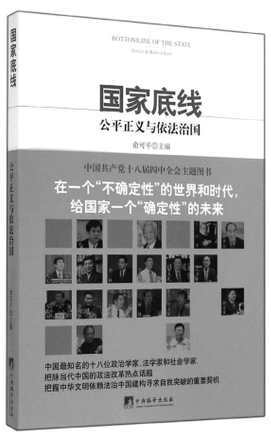
另一“风”——《风语》，讲述的是“中国黑室”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数学奇人，天才的破译家。他手无缚鸡之力，却令人谈之色变；他不识枪炮，却是那场战争中最大的战斗英雄；他在纸上谈兵，却歼敌于千里之外；他孤身一人，但起的作用却抵得上一个野战军团；他门外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却依然生死有虑……由于其极重要的价值，黑室让他变得更加神奇：他活着，就有更多的人幸免于死；他活着，就有更多的人为他而死；他活着，就有传奇，就有故事，就有人世间最欢心的事、最揪心的痛。

麦家的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故事距离一般人相对神秘遥远，并且写作手法悬幻、气氛诡秘、构思别异，可是，作品中的人物，甚至故事，大都有原型和相应情节的现实支撑，人物心理也富有内涵和符合运行逻辑，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不觉飘忽，反而能在一种近乎通俗作品的手法运用中，成长出开掘深刻人性的饱满果实。这是麦家作品一方面拥有极多受众，另一方面又得到文艺界认可的重要因素。

不仅国内，在国际交流中，麦家的作品同样获得好评和成功。据有关资料，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其中《解密》英文版收入英国著名的“企鹅”经典文库；2013年8月29日，麦家的作品《暗算》西班牙文版首发式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暗算》（西班牙文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全球第八大出版集团、西班牙语世界第一大出版集团——普拉内塔集团合作出版，这也是普拉内塔集团从中国直接引进的第一本当代文学作品。西班牙语是拉美地区多个国家的通晓语言，麦家作品在这里发行传播，形成影响，这应该是他这次随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诸国的重要原因。

麦家的作品，手法虽多样丰富，根底却在厚实的内容和历史真实，这是极为值得我们关注的。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在有很好卖点的同时传播一种精神，这一点，是无论小说写作或影视作品改编需要认真对待的。眼下一些谍战片四飞却不尊重历史真实，给观众带来负面效果和不良印象，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向麦家作品学习取经。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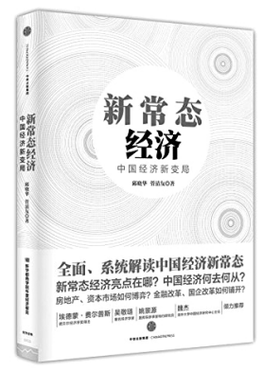


书名：《国家底线：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

作者：俞可平/主编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0月

作者谈书：做人要有底线，治国同样要有底线。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就是现代国家的底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这清楚地表明，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也同样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线。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显而易见，离开民主去谈论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谈论自由贸易一样不得要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法治是公平正义的根本制度保障，它们都是现代国家的底线。



书名：《新常态经济：中国经济新变局》

作者：邱晓华 管清友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

推荐人：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推荐语：这是一本全面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书。目前，中国经济以高资源投入支撑GDP高速增长的旧常态已经无法继续维持。我们要用“平常心”看待GDP增长减速的现实，而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率，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应当无所作为。正如邱晓华、管清友这本书所阐述的，应该加快推进供给端的改革和转型，着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这样就能确立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书名：《无界战：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

作者：郭高民

出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编者谈书：作为“第一部揭示战争平台演进规律”的著作，本书突破传统理论窠臼，将世界的基本规律表述为“二元三阶段规律”，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游猎时代、农工时代和信息时代，以此为思维框架展开论述。“无界战”所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思维。在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际格局下，我们只有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打破“界”的局限，把生命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才能对国际争端、生态危机及其他全球性问题有一个“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战略选择。

发展互联网经济应避免误区

□阿里研究院

目前，各地发展互联网、电商经济热情高涨，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也投入了不少人力、资金。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互联网＋”战略举措之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经济，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希望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但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模式和形态，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我们应不断解放思想，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避免传统工业经济思维下的几个误区。

自建平台的误区

很多地方都提出“以平台为抓手”，鼓励自建本地的综合平台或行业、垂直类电商平台。例如，某西部省份在“电子商务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要投入巨资建成20个垂直电商平台。对这个问题要特别地慎重，平台经济确实有巨大的生态聚集效应，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电商的抓手，也容易出政绩，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投资风险。

电商平台具有基础设施的属性，除了信息汇聚，还需要交易支付、云计算支撑、商业大数据服务、物流快递、金融服务等服务配套，是一个商业生态体系。平台投资大、周期长，初期动辄上亿元的投资，同时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不断升级改造，历经数年才能形成自我循环的生态圈。

行业普遍的看法是，全国性的综合电商平台不会超过10家；细分行业的电商平台，每个行业最多1—2家。有实力发展平台经济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其他地方受人才、技术制约，机会并不大。目前来看，很多地方、企业在自建平台上走了弯路。譬如，仅红木交易，全国就有约20个交易平台，绝大部分规模较小、技术落后，难以维持运营。再比如，全国百货业大部分自建平台，1998年，天虹推出了全国首家可在线下单与支付的网上百货商场，但一直以来，许多门店的当季新品并未在“网上天虹”销售。于2001年建立了“i购物网”的西单商场，曾在短时间内捕获数十万注册量以及上百家入驻商家，迅速赢利，但目前一直处于下单量极少、客单价较低的状态。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初期呈现“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的商业格局，即广大中小企业依托大平台、丰富的电商生态系统，开展前端的营销、客户服务功能，发展本地的优势产业。

招商引资的误区

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都希望引入知名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投资、入驻。但互联网的根本特点就是跨地域，即使平台企业的注册地，或者服务器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发达地区，也一样可以服务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客户。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工业经济。

所以，地方政府发展“互联网＋”的重点是推动本地优势企业利用互联网转型升级，即扶持本地互联网应用企业、电商企业、互联网服务商发展。

一味追求“高大上”的误区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特点是从边缘到主流，一开始总是小微企业反应最快。很多大型互联网企业、电子商务企业也是从小微企业做起来的，但在互联网上，电商企业成长非常迅速。例如，像茵曼、韩都衣舍这样十亿规模的企业，也只有5—6年的时间。千万级的电商企业一般也只需要2—3年的时间。

因此，在互联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一方面要推动当地传统的大企业利用互联网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鼓励年轻人创业，培育千军万马，营造万众创新的氛围。

电子商务就是开网店的误区

电子商务是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改造传统的商业流通业。开展网络零售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和基础设施，推动本地的零售业、批发业、产业集群、金融、外贸、制造业、本地生活服务业等转型升级。

回头来看，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干预较少，“重视”不够，导致市场机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未来，要收获互联网经济的全部果实，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放松管制，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小微企业、草根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对于电子商务领域出现的各种新鲜事物，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鼓励尝试和创新，允许失误和失败。

摘自阿里研究院《互联网＋：未来空间无限》（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

书摘